

許學夷對元和時期詩歌的看法

謝旻琪

一、對「變」的審查

許學夷，字伯清，南直隸江陰（今江蘇江陰）人，生於明嘉靖四十二年，卒於崇禎六年（1563-1633），為晚明復古派後期的文人。他所撰寫的《詩源辯體》，是一本關於考察各朝代詩體流變狀況的著作。他認為：「詩自《三百篇》以迄於唐，其源流可尋而正變可考也。學者審其源流，識其正變，始可與言詩矣。」¹辨明正變源流，方可言詩，這是他理論最重要的核心。

對於文學史的探索，必須從各個時代文學的風格樣貌來展開。陳國球指出，古代詩論家對於詩史的看法，大致可分為兩大類：

一、認為歷代詩歌各擅場，各極其至，無需強分高下，也不必作綜合整理。例如袁宏道〈敘小修詩〉所說：「唯夫代有升降，而法不相沿，各極其變，各窮其趣，所以可貴；原不可以優劣論也。」以及錢謙益〈古詩贈新城王貽上〉所說：「千燈成一先，異曲皆同調；彼哉譏議者，穿穴分科條。」都可劃規這一大類。

二、認為詩有隆盛之時，也有衰落之世，其中興替轉移的契機和演變脈絡，都值得審視，甚或作為當前創作的導引或鑑戒。²

重古學的文人，多半為前述的第二種。明代的復古派的文人，都會講求對源流、正變的審查，一方面幫助自己找尋歷史定位，另一方面則透過對於「本色」的掌握，助於訂立典範。許學夷就是這一類的文人。大抵說來，他的正變觀，是接續著明初以來，包括高棅、前後七子、胡應麟等人的觀點，加以補足、修正而來。³

然而，他的針對性比此前的文人更強些。一方面，他對於復古派論述不足、逐

¹ 許學夷：《詩源辯體》，周維德集校：《全明詩話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5年6月），頁3178。本文所引出自《全明詩話》者，皆採此版本，以下不再註錄。

² 陳國球：〈胡應麟詩論中「變」與「不變」的探索〉，《鏡花水月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7年12月），頁89-90。

³ 關於明初以來正變觀的流變，以及許學夷與高棅、前後七子、胡應麟等人理論的關係，已有不少學者論及。本文主要參考為孫學堂：〈元明唐詩正變說述論〉，《文藝理論研究》2010年第三期，頁91-96。

漸走向取徑狹隘的問題感到憂心。復古派的學習方式，正是透過精細的揣摩，久之入悟，然後變而化之。而他們歸納出取法重點，「立志須高」、「入門須正」的訴求下，卻發展出人們貴古賤今、模擬剽竊的弊端。學習者不讀大曆以下書，只從盛唐詩入手，又未能變而化之，結果僅停留在揣摩的階段。復古派後期，文人們對此展開檢討，他們不滿於取徑的狹隘，轉而主張博取眾家之長，如後七子的謝榛認為需「由乎中正，縱橫於古人眾迹之中」⁴，王世貞則認為「師匠宜高，捃拾宜博」⁵；末五子中的李維楨也認為：「慕古之士，束唐以後書不觀，必若所云，人世亦何用有今？」⁶他們在仍然以漢魏、盛唐詩為尊的同時，也逐漸認同「一代之才，即有一代之詩」。⁷許學夷即是在此背景中，更加強調「識」的重要性。他認為，「學者以識為主，則有階級可循，而無顛躓之患」。⁸基於此，許學夷針對各詩體、朝代、作家的藝術樣貌，都做了精細的考察。

另一方面，代表當時風氣反動的公安派和竟陵派，則是開始找尋新的典範。他們刻意地選取被冷落的中晚唐、宋元詩，來取代漢魏、盛唐詩。然而，不論是「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」，還是「別創深幽孤峭之宗」，新的取法方式雖可一時之間改變風潮，卻未能對人們的識見狹小有所改變。許學夷對此有所批判：「二氏既以師心為尚矣，然於學漢、魏，學初、盛唐，則力詆毀；學齊、梁、晚季，又深喜之。」⁹尤其公安派所強調的，正是陳國球先生所說的第一種論述方式，許學夷非常反對。他說：

或言：漢魏、六朝、初盛中晚唐，各有所至，未易優劣。予曰：不然。《三百篇》而下，惟漢、魏、古詩、盛唐律詩、李、杜古詩歌行，各造其極；次則淵明、元結、韋、柳、韓、白諸公，各有所至；他如漢、魏以至齊、梁，初、盛以至中、晚，乃流而日卑，變而日降。其氣運消長，文運盛衰，正當以此別之。苟為無別，則齊、梁可並漢、魏，而中、晚可並初、盛也。詩道於是為不明矣。¹⁰

要能夠對各個時代、各個作家，分辨源流，品評高下，才能夠明詩之道。

為了明詩道，許學夷前後花了四十年的時間，共十二次易稿，寫成這部詩學巨著。當他年老無法再書寫時，是他的姪輩替他寫的。如此用盡心力，可見他自覺的

⁴ 謝榛：《四溟詩話》卷三，《全明詩話》，頁1343。

⁵ 王世貞：《藝苑卮言》卷一，《全明詩話》，頁1886。

⁶ 李維楨〈祁爾光集敘〉，《大泌山房集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明萬曆三十九年刻本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7年），集部第150，頁522。

⁷ 李維楨〈宋元詩序〉，頁496。

⁸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三十四，頁3364。

⁹ 《詩源辯體·自序》，頁3159。

¹⁰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三十四，頁3364。

歷史責任感有多麼強烈。然而，這部書在當時並沒有受到重視，冷清寂寥了三百年¹¹，直到最近大約十年來，才突然成為晚明研究者的重點，儼然成為一門顯學。相對於出版當時的孤掌難鳴，這部書似乎是寂寞了太久。

現今雖對於許學夷《詩源辯體》已有許多相關研究成果，本文仍想針對許學夷對於元和時期詩歌的看法，進一步探討。《詩源辯體》全書四十卷中，論及唐詩的篇幅如下：

初唐：卷十二到卷十四，共三卷。

盛唐：卷十五到卷十九，共五卷。

中唐：卷二十到卷二十九，共十卷——大曆時期共四卷，元和時期共六卷。

晚唐：卷三十到卷三十二，共三卷。

他對於詩的流變，有這樣的概括：

統而論之，以《三百篇》為源，漢、魏、六朝、唐人為流，至元和而其派各出。析而論之：古詩以漢、魏為正，太康、元嘉、永明為變，至梁、陳而古詩盡亡；律詩以初、盛唐為正，大曆、元和、開成為變，至唐末而律詩盡敝。¹²

也就是說，中、晚以後，為變、為敝，但他對於他所認為走向衰頹的、變的時期，共用了十三卷的篇幅來論述，尤其是元和時期，竟然比他最重視的盛唐論述更多。

許學夷為了避免學習者的誤會，他為此澄清：

此編或疑元和諸子纂錄過多，不免變浮於正。然此編以辯體為主，元和諸子，一一自立門戶，既未可缺，其篇什恒數倍於初、盛，則又不可少，正欲學者窮極其變，始知反正耳。¹³

予作《辯體》，於漢、魏、六朝、初盛中晚唐，既詳論之矣，而於元和諸公以至王、杜、皮、陸，亦皆反覆懇至，深切著明，正欲分別正變，使人知所趨向耳。¹⁴

他反覆申論，只是為了告訴世人，他如此重視元和時期之「變」，是為了讓人們能綜觀遍覽，識得諸家體制之後，才能了解學習的正途。

二、元和時期詩歌的地位

與歷來的復古論者意見差不多，許學夷認為中唐就是詩歌由盛轉衰的關鍵時

¹¹ 關於《詩源辯體》出版後的流傳情形，可參見謝明陽〈許學夷《詩源辯體》在晚明的傳播與接受〉，《東華人文學報》第五期，2003年7月，頁299-338。

¹²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一，頁3178。

¹³ 《詩源辯體·凡例》，卷一3163。

¹⁴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三十四，頁3364。

期。許學夷說：「中唐諸子，才力既薄，風氣復散，其氣象風格宜衰，而意主於清空流暢，則氣格益不能振矣。」中唐走向衰頹，氣格不復振，然而比起晚唐來說，至少氣格較盛，且尚有神韻可說。他又說：「中唐五、七言律，氣格雖衰而神韻自勝，故諷詠之猶有餘味；晚唐諸子，氣格既亡而神韻都絕，故諷詠之輒復易厭。」¹⁵晚唐之後，就是衰亡時期了。復古論者通常抱持著類似的立場，只是許學夷更進一步的，不但用了十卷的篇幅來論述中唐之變，而且他比此前的論者更注意元和時期的地位，顯示他對於這個轉變時期的考察格外重視。¹⁶

前已述及，許學夷將中唐分為大曆和元和兩個時期，共寫了十卷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十卷之中有六卷，都是討論元和時期。那麼，元和時期的地位究竟如何呢？可分為以下幾點來談。

（一）議論痛快，以文為詩，故為大變

首先，許學夷認為，元和時期是詩史上的「大變」時期。許學夷論「變」時，區分了「正變」和「大變」。所謂的「正變」，是指「皆自一源流出，體雖漸降，而調實相承」者，「如堂陛之有階級，自上而下，級級相對，而實非有意為之」；而「大變」則是指「萬怪千奇，其派各出」，偏離了源流。¹⁷元和時期，即屬於「大變」。

這個時期的詩風，何以會被歸於大變？許學夷說：「元和諸公，議論痛快，以文為詩，故為大變。」¹⁸一直以來，使事、說理在詩中的比重，是詩家討論文體學、創作論時的一個大重點。以詩體而言，若使事、說理太多，則跨入「文」的領域，對於詩體來說，是個傷害。歷來詩家的討論眾多，在此不多贅述。重點是，元和時期的詩人，以文為詩，多有議論，而且是萬怪千奇、有意為之的，偏離了大曆以降詩發展的源流，而成為大變。

而這種變非憑空而來。許學夷指出一個重要的源頭，就是陶淵明。

五言自漢、魏至六朝，皆自一源流出，而其體漸降。惟陶靖節不宗古體，不習新語，而真率自然，則自為一源也。然已兆唐體矣。（下流至元次山、韋應物、柳子厚、白樂天五言古。）¹⁹

¹⁵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一，頁3316。

¹⁶ 孫立的〈從元和體到宋體——許學夷論元和體及其與宋詩的關係〉一文（《湛江師範學院學報》，2006年2月，第27卷第1期，頁21-26）雖已提及元和體與宋詩的關係，然而文中諸多謬誤。第一，文中認為許學夷用了三卷論述「元和體」，實際上許學夷論述元和時期共寫了六卷；第二，文中所為「與宋詩的關係」內容相當少，不足以做為該文之主軸。

¹⁷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三十二，頁3357。

¹⁸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三，頁3321。

¹⁹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六，頁3236。

按照許學夷的說法，「古詩以漢、魏為正，太康、元嘉、永明為變，至梁、陳而古詩盡亡」，他提出了唐有「唐體」。這與李攀龍所提出「唐無五言古詩，而有其五言古詩」²⁰之說，非常相似。他們都認為唐代的五言古自成一格，與漢魏的「正宗」不同。陶淵明在五言古詩的變異，開啟了元和之際的詩風。許學夷又將元和詩人與陶淵明做了一番比較：

或問予：予嘗言：元和諸公，以議論為詩，故為大變。若靖節「大鈞無私力」、「顏生稱為仁」等篇，亦頗涉議論，與元和諸公寧有異耶？曰：靖節詩乃是見理之言，蓋出於自然，而非以智力得之，非若元和諸公，聘聰明、構奇巧，而皆以文為詩也。²¹

事實上，詩中難免有議論的成分。但元和詩人與陶淵明的不同，即在於陶淵明是自然而出，元和詩人乃是靠聰明、才力，有意為之。

而為世人盛讚的李白、杜甫，也有類似以文為詩的成分。與元和時期詩風要怎麼區別？許學夷提出這樣的看法：

太白歌行，雖大小短長，錯綜無定，然自是正中之奇。元和諸公，雖或通篇七言，而快心露骨，自是大變。學者於此能別，方是法眼。²²

快心露骨，是元和時期的重要標誌。所謂「快心」，指的是心中暢快，而「露骨」，則是指顯露、不含蓄而言。也就是說，元和時期的以文為詩，是一種顯露、不含蓄的表達方式，必須要議論滔滔，使人讀來為之暢快。許學夷又說：

或問予：予嘗言元和諸公之詩，快心露骨，故為大變。今觀李、杜五言古、七言歌行，實多快心，與元和諸公寧有異乎？曰：太白快心，本乎豪放；子美快心，本乎沉著。自是詩歌極致。若元和諸公，則鑿空構撰，議論周悉，其快心處往往以文為詩，方之李、杜，其正與變不待較而明矣。²³
五言古、七言歌行，太白以興為主，子美以意為主。然子美能以興御意，故見興不見意；元和諸公，則以巧飾意，故意愈切而理愈周。此正變之所由分也。²⁴

許學夷的態度，是希望以客觀的方式討論正變。然而，崇正黜變的傾向仍時時流露。

²⁰ 關於李攀龍的說法，陳國球有專文論述。詳見陳國球：《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1月）。

²¹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六，頁3238。

²²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十八，頁3296。

²³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十八，頁3293。

²⁴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十八，頁3292。

元和詩人之所以為變，是一種耍弄機巧、馳騁聰明的，刻意地以「理」來表「意」，而非來自興趣，與李、杜高下自別，正變自明。

（二）各立門戶，以才力相勝

雖然有崇正黜變的傾向，但許學夷承認元和詩人的「才」。他說：「元和、晚唐諸公，各立門戶，實以才力相勝。」能各立門戶，這算是稱賞的了，然許學夷也做了區分：「其才力有大小，故其門戶亦有大小耳。以韓、白二公與餘子相比，則知之矣。」²⁵韓愈、白居易，為元和時期才力最大者。

許學夷承認元和詩人的才力。元和時期之所以為「變」是由於各家識見不同之故。他說：

學者以識為主，以才力輔之。初、盛唐諸公，識見皆同，輔之以才力，故無不臻於正。元和、晚唐諸子，識見各異，而專任才力，故無不流於變。……蓋盛世尚同，而衰世尚異，亦理勢之自然耳。²⁶

他指出一個重點，就是「盛世尚同，衰世尚異」。盛世之時，人們傾向追求同一、莊重的美感，而衰世時，則追求新穎和變異。元和已走向衰世，文人識見各自不同，所幸有各自的才力，所謂「非有才不足以濟變」²⁷，才能各立門戶。

「立門戶」，是歷來詩家的理想。他們研究、討論，無非是為了學習作詩的法度，終極目標就是能夠「立門戶」。陳國球說，「胡應麟所謂『立門戶』是說另創新格，許學夷說二李『自立門戶』、『成家』是只能夠在文學史上爭一席位」。²⁸雖立門戶可能在詩家的討論中，內涵未必相同，但不論是另創新格還是爭一席位，都是希望發展出創作的主體性。

元和詩人能各立門戶，但是許學夷要學習者注意的是，識得正變，才是學詩的首要，必須要了解元和時期之所以能夠自立門戶的原因。他說：

五言自漢、魏至陳、隋，自初、盛至晚唐，其變有漸，正由風氣漸衰，習染相因耳。至李、杜、韋、柳以及元和諸公，方可謂自立門戶也。今之輕進自喜者，謂漢、魏、六朝、唐人之變，皆自立門戶。此雖一己之偏，實未知變之有漸耳。²⁹

他又說：

²⁵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四，頁3323。

²⁶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三十四，頁3365。

²⁷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三十，頁3344。

²⁸ 陳國球：〈胡應麟詩論中「變」與「不變」的探索〉，同註1，頁313。

²⁹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五，頁3230。

今人作詩，不欲取法古人，直欲自開堂奧，自立門戶，志誠遠矣。但於漢、魏、六朝、初盛中晚唐，果能參得透徹，醞釀成家，為一代作者，孰為不可？否則，愈趨愈遠，茫無所得。如學書者，初不識鍾、王諸子面目，輒欲自成家法，終莫知所抵至矣。況自漢、魏以至晚唐，其正者，堂奧固已備開，變者，門戶亦已盡立，即欲自開一堂，自立一戶，有能出古人範圍乎？故與其同歸於變，不若同歸於正耳。³⁰

他所擔憂的，一種是見獵心喜，看到元和時期之變，能自立門戶，就以為凡「變」都是自立門戶。他指出，「變」是由於風氣漸衰的緣故，若不能了解詩的流變，很容易就走偏了。另一種，是好高騖遠，自以為可以輕易的自成一家，但不知取法，不知方向，學習就變得漫無目標。因此他主張泛覽博觀，培養識見，了解正變，最重要的是，唐詩無論「正」還是「變」，都已發揮到極致，後人很難再有所超越了，所以不如學習涵養，同歸於正。換言之，他否定了經由「變」自成一家的做法，也否定了其可能性。

（三）異端曲學，必起於衰世

許學夷從詩體演變的角度，指出元和時期是整個轉變的關鍵。儘管承認「變」是元和時期的詩歌特色，也承認了他們的才氣，但是這種變，畢竟是因為這是衰世，於是他用了「異端曲學」來比擬這個時期的變異：

大曆以後，五、七言古律之詩，流於委靡。元和間，韓愈、孟郊、賈島、李賀、盧仝、劉叉、張籍、王建、白居易、元稹諸公群起而力振之，惡同喜異，其派各出，而唐人古、律之詩至此為大變矣。亦猶異端曲學，必起於衰世也。³¹

大曆時期，是由盛轉衰的時期。元和詩人們企圖振作詩風，帶入了「議論」的方式來寫詩。雖然確實在文學史上有重大的意義，但是許學夷認為，還是必須從歷史的興衰來看詩的興衰。他說：

詩文雖與國運同其盛衰，然必盛於始興，衰於末造，故古詩必合漢、魏、六朝以為盛衰，唐律則以初、盛、中、晚為盛衰也。³²

詩道興衰，與國運相若。大抵國運初興，政必寬大；變而為苛細，則衰；再變而為深刻，則亡矣。……學者苟能熟讀而深究之，則詩道之興衰見矣。³³

³⁰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三十四，頁3366。

³¹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四，頁3323。

³²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三十四，頁3364。

³³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三十四，頁3370。

復古派的文人多半相信「文章關乎世運」、「聲音之道與政通」的道理，衰世與盛世的氣象不同，詩歌的美感樣貌也會不同。許學夷特別要人警醒，詩歌的興衰與歷史的興衰相結合，唯有熟讀深究，才能明興衰。這是具有歷史責任感的表現。

更重要的是，正因為異端曲學起於衰世，而異端曲學往往給人新奇的感受，卻畢竟非正道，所以許學夷對於這種「變」的態度非常謹慎，無論在閱讀上、取法上，都要很小心。他說：

元和諸公五、七言古，其資性庸下者既不能讀，資性高明者又未可遽讀。元和諸公如異端曲學，多縱恣變幻，資性高明者，未識正變而遽讀之，不免為惑耳。³⁴

《三百篇》、漢、魏、初盛唐之詩，皆法也；自此而變者，遠乎法者也。晚唐、宋、元諸人所為詩法者，弊法也；由乎此法者，困於法者也。且漢、魏、六朝體製相懸，初、盛、中、晚氣格亦異，晚唐、宋、元諸人略不及之，顧獨於章句之間，搜剔穿鑿，愈深愈遠，詩道至此，不啻掃地矣。³⁵

不論資質聰明或驚鈍，乍讀新穎的異端式的「變」，都會為之迷惑，因此，學詩首要在識正變。識得正變，才能理解詩之法。他又說道：

盛唐諸公五、七言律，多融化無跡而入於聖；中唐諸子，造詣興趣所到，化機自在，然體盡流暢，語半清空，其氣象風格，至此而頓衰耳。故學者以初唐為法，乃可進為盛唐；以中唐為法，則退屈益下矣。嚴滄浪云：「學者以盛唐為師，不作開元、天寶以下人物。若自退屈，即有下劣。」此不易之論。³⁶

延續著嚴羽以來「立志須高」、「入門須正」的觀念，應由《三百篇》、漢、魏、初盛唐入手，才能明乎正道。

相對而言，許學夷比一般復古論者較為科學，也較客觀。他並不是對中晚唐詩歌比較寬容，他有他價值上的取捨，對於各個時代做了細部的考察、探討後，可以看出，他還是帶著一種崇正黜變的傾向，去看待這些變異。所以，他對於元和詩人發揮各自的才力，以議論為詩，造成詩歌的變異，是非常謹慎戒備的。

三、元和時期作家

許學夷說元和時期的作家「一一自立門戶」，這是個頗為特別的評價。前已述

³⁴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四，頁3323。

³⁵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三十五，頁3377。

³⁶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一，頁3315。

及，許學夷帶有崇正黜變的傾向，但是他並不會全然以「正」和「變」來當作優劣的劃分標準，正有正的時期本色，變有變的。

陳國球曾指出，文學的分期，乃是由「時間」和「規範系統」兩者交互制衡，當一時期的大部分文學作品都遵從某些準則，包括主題、思想、風格等，一個規範系統便產生了。³⁷大環境確實會影響作家的創作方向，一時期中，文人會有某種趨向。許學夷也是以此來歸納出時代本色的。然而，當他仔細考察了一時代的諸多作者、作品之後，歸納出某種時代的特色，如果又反過來以此時代特色，來檢視個別作者，說這位作者符合或不符合本色，如此是否合理？

很有趣的是，積極於辨體的論者，往往未能針對這點提出進一步的論述。許學夷的考辨可以說是非常細緻，但是他究竟是考察作者，以歸納出一個時代特色，還是對一個時代特色已有定見，以此來檢視作者是否符合這個時代特色，其界線是很模糊的。

在這個「以文為詩」，作家們都能「一一自立門戶」的時代，許學夷的論點是很有意思的。

首先看柳宗元。柳宗元的地位很有趣，他雖是元和詩人，但他是元和時期唯一一個不列入「大變」的詩人，也是全書中唯一一個被歸納在「正對階級」的人。許學夷按照各別詩體來說明柳宗元的位置：柳宗元的五言古詩，「經緯綿密，氣韻沉鬱」，語言較其他元和詩人為溫潤；七言古詩，是「氣格雖勝，然鍛鍊深刻，已近於變」；而五言長律及七言律則是「對多湊合，語多妝構，始漸見斧鑿痕，而化機遂亡矣」，這是屬於「正變」的範疇。從柳宗元的作品來看，都與元和時期的「以文為詩」、「以議論為詩」，或說「快心露骨」，很不相同。至於「正對階級」，許學夷認為：「開、寶至大曆，則流暢清空，風格始降；元和至開成，則工巧襯貼，作用日深。前以風格言，後以作用言也。蓋風格既降，自應作用耳。」³⁸大曆是由盛轉衰的分界。風格，指的是風神、格調，這不是用技巧可以完成的事。然而風格降低，接下來就是作用層的問題，人們開始運用技巧，運用智力，使詩能夠工巧襯貼。柳宗元正是處於這個交界處的人物。

再來是韓愈。許學夷對他的五言古詩和七言古詩極為讚賞。「於窄韻既極奇險，於寬韻又極豪縱」、「然豪縱者未嘗不奇險，而奇險者未嘗不豪縱也」，所以是「大變」。韓愈才氣橫溢，遍覽群書，因此字句信手拈來，引事處處妥貼，固然可以奇險豪縱。許學夷也提醒讀者：「後世貪多騁博者，往往用事填塞，不惟句法臃腫，

³⁷ 陳國球：〈胡應麟詩論中「變」與「不變」的探索〉，《鏡花水月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有限公司，1987年12月）頁102-108。

³⁸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三，頁3321-3322。

文氣支離，而措置無方，如暴富兒夸靡鬪奢，適足露其寒儉相耳。」³⁹

孟郊之變，與韓愈不同。他的五言古詩是「不事敷敘而兼用興比，故覺委婉有致。然皆刻苦琢削，以意見為詩，故快心露骨而多奇巧耳」。韓愈是縱恣的，而孟郊是琢削的，兩人呈現的風格樣貌差異非常大，但兩人的藝術成就是可相匹敵的。

40

賈島雖與孟郊往往並稱，但許學夷很不欣賞他。許學夷對於賈島的五言律詩評語還算持平，也說出他之所以為大變的原因：「氣味清苦，聲韻峭急，在唐體尚為小偏，而句多奇僻，在元和則為大變。」但許學夷批評他的五言古為「醜惡」，還說：「元和諸子之詩雖成變體，然其才識則固有過人者。惟賈島才力既薄，而識見尤卑。」只是這樣的苦、急的詩風，「先已逗入晚唐纖巧」⁴¹，是詩體源流的緣故。

其他像是李賀樂府的「調婉而詞豔，然詭幻多昧於理」⁴²，或是張籍、王建的樂府「意多懇切，語多痛快，正元和體也」⁴³等，都可以看出，元和時期詩人各有各的語言特色，但共同表現出來的，就是敘事成分要比大曆及之前要來得多。

白居易尤其為元和時期的代表人物。許學夷摘了非常多白居易的詩句，反覆說他的詩「用語流便」、「敘事詳明」、「議論痛快」等等。按照許學夷的說法，白居易的重要性有二：

一，白居易乃「變」到成熟、極致的代表。許學夷說：「元和間五七言古，退之奇險，東野琢削，長吉詭幻，盧仝、劉叉變怪，惟樂天用語流便，似若欲矯時弊，然快心露骨，終成變體。」

二，白居易的「變」是自覺的，不得不然的。許學夷說：「樂天詩，非不自知其變，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縛，故不得不然。觀其《和答微之詩序》云：『頃者在科試間，常與足下同筆硯，每下筆時輒相顧，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。故理太周則辭繁，意太切則言激。然與足下為文，所長在於此，所病亦在於此。』故知其不得不然耳。」⁴⁴

從大曆的詩風衰頹，元和詩人在衰頹中圖振作。我想，時代的氛圍確實會主導文人的創作趨向。他們走上了說理一途，並因為各自的才性，而展現不同的說理樣貌。白居易就像是這個階段的完成者，自知該採取怎樣的方法，而真正走出一條新的路。

³⁹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四，頁 3324-3326。

⁴⁰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五，頁 3327-3328。

⁴¹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五，頁 3328-3330。

⁴²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六，頁 3331-3332。

⁴³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七，頁 3334。

⁴⁴ 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八，頁 3337-3341。

四、結語

許學夷與歷來的論者一樣，都認為元和時期詩歌最大的特色，就是「以文為詩」、「以議論為詩」。元和時期的詩歌確實展現了這樣的風貌，只是許學夷比其他論者抱持更客觀、更科學的態度，並不因為他們的詩風脫離了盛唐的「正宗」而避之不談，相反的，他貼近的去細細考證，所撰述的篇幅，甚至比他論及盛唐詩的部分要更多。

他認為，元和時期是很重要的代表「變」的時期。元和時期的作家都具有才力，也都各自精彩，但他對這個時期的閱讀非常謹慎，他認為學習者要慎選典範，而選擇典範的首要，就是明正變源流，才不致被這個時期的新奇所迷惑。

另外，許學夷提到，元和時期詩人，是力圖拯救衰頹的詩風，而在創作方法上有所變革，但許學夷討論的變，並不是從創作者主動的變革來看，從細部，包含時代、作家、作品，一一考察詩體的流變。那麼，究竟是他經過細部的作家、作品考察，來歸納出時代的本色，還是他早有對一時代本色的定見，用以檢視各個作家作品呢？許學夷的方法或許是混淆、模糊的，畢竟他是一個很用功的學者，許多的知識早已內化，或許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但是更多時候，他或許更傾向用後者來論述。

我們可以從兩個例子來看。首先是他針對元和時期的本色來談：

樂天五言古最多，而諸家選錄者少，蓋以其語太率易而時近於俗，故修詞者病之耳。然元和諸公之詩，貴快心盡意而縱恣自如，故予謂樂天詩在退之之下，東野之上。或有取於東野而無取於樂天，非所以論元和也。⁴⁵

很顯然的，他的取捨方式，是站在文體的角度來看，而非語言的優劣或雅俗。既然元和時期之「體」，應該要「快心盡意」、「縱恣自如」，那麼，他會認為韓愈為第一，白居易居次，而孟郊再次。

再來是論正變和優劣的問題。他說：

韓、白五言長篇雖成大變，而縱恣自如，各極其至；張、王樂府七言雖在正變之間，而實未盡佳。選者於韓、白五言長篇不錄，而多采張、王樂府，蓋元和主變，而選者貴正也。⁴⁶

他從正和變的角度，來說明一般人會寧願選擇成就稍低，但更接近正統的作品。是正變還是大變，並不會影響他評判優劣的標準。他由此顯得比其他論者更客觀許多。

⁴⁵ 許學夷：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八，頁3338。

⁴⁶ 許學夷：《詩源辯體》，卷二十七，頁3334。